

热历史

古人写日记始于何时

现在不少人都有写日记的习惯,其实古人也喜欢写日记。但很少把自己写的日记称为“日记”,往往以“记”“纪”“录”“志”等形式出现,有“日录”“日历”“日谱”“日志”“日谈”“日注”“计日”等称呼。那么,古代人如何写日记?

2000多年前中国人已开始写日记
西汉“日记牒”为考古发现中最早的日记

中国人似乎有一种写日记情结,古人留下来的日记相当丰富。中国人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写日记的?研究中国日记史的专家陈左高早年认为,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就是一种最原始的日记,或者说日记的滥觞。但由于日记是私人性质的,陈左高后来又否定了此观点。

对于日记起源时间,古今不少学者都曾作过考证。陈左高在《历代日记丛谈》中列出了“西汉说”“东汉说”“唐代说”等不同观点。西汉说认为,当时朝廷派出的陆贾、苏武、张骞等使臣都会详细记载每天的出行情况,这就是“日记”。曾任晚清总理衙门大臣、爱写日记的张荫桓也持此观点,他在日记中称:“陆生使越、苏武使匈奴、张骞寻河源、陈汤、陈甘延寿定郅支、博征约记,史佚之耳。”

然而,“西汉说”在20世纪80年代前并无定论,因为无存世资料,从书写体例上也找不出证据。变化出现在1981年,

当年第11期《文物》上发表了由扬州博物馆和邗江县图书馆联合署名的一篇考古报告《江苏邗江胡场五号汉墓》。胡场五号汉墓系一座木椁小型墓,方形,竖穴,异葬,系夫妻合葬墓,是1980年4月中旬,当地群众在整修水沟时挖到的。虽然此墓中出土文物丰富,但如果不是同时出土的13件木牍遗文,此报告可能并不会引起太多学者的注意。13件木牍中,文字可辨的有6件,但能识读的仅5件,粗分为“神灵名位牒”“日记牒”“文告牒”“丧祭物品牒”四类。其中的“日记牒”,便相当于现代的“日记本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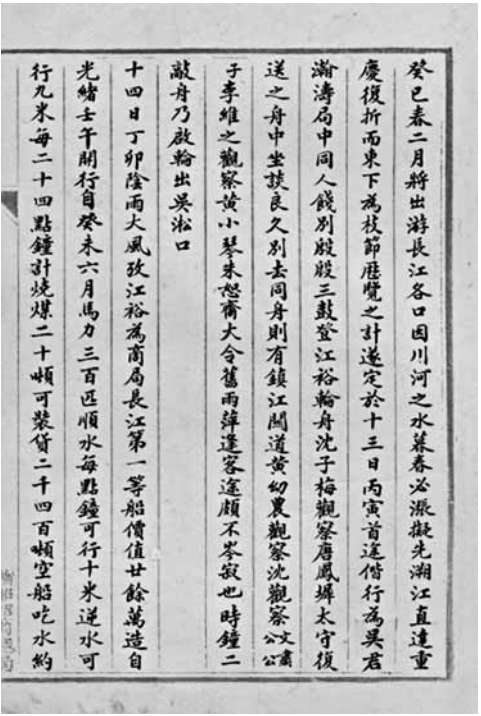
这一考古发现,让持“西汉说”观点的学者异常兴奋,“东汉说”“唐代说”便不值一驳了。陈左高在其《历代日记丛谈》中称:“这一发现,给我们提供了最早一位有具体姓名的日记作者,有年月日的日记作品,足以印证日记溯源,推前至二千年前的西汉,即公元前,允无疑义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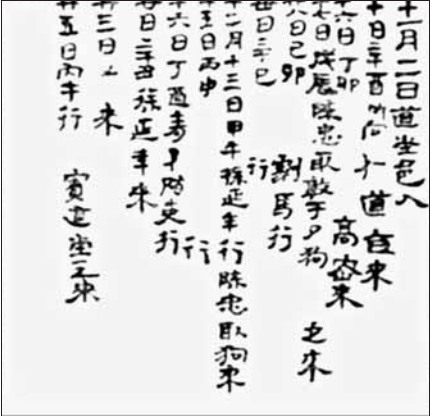
木牍是纸张未发明和普及前古人写日记的载体,图为西汉木牍。



书房中爱写日记的古代文人，图为明代仇英摹宋人画册。



清郑观应《长江日记》内页。

迄今最早的日记竟为“狱中日记”
西汉王奉世文告牒中记载“有狱事”

汉代王奉世“日记牒”(摹),系迄今有具体主人的最早日记,扬州邗江胡场五号墓出土。

木牍遗文之所以引起注意是因为很少见,当时在扬州地区也是首次发现,史树青、李学勤、于豪亮、李均明等多位国内文史权威专家都赶到扬州,帮助释文。最后确定,墓的男主人叫王奉世,死于汉宣帝本始三年(公元前71年)十二月十六日。

为了更全面了解墓主人的身份信息,当时上海自然博物馆人类组还对王奉世夫妇的遗骸进行了鉴定。鉴定结果令人吃惊,王奉世的头骨异常,疑生前受刑或长

期受重压所致,死亡时仅30岁左右;其妻年纪更轻,20岁左右。

有此遗骸鉴定结论,结合文告牒中王奉世“有狱事”的记载,学术界认为,所出土的“日记牒”为王奉世生前的“狱中日记”。

日记中所记人物,有的来自邻近郡县,如堂邑(今南京六合区西北),也有来自较远地方,如高密(今山东高密,时属高密国),敦于(即淳于县,今山东安丘县东北)。

日记牒的书写较为草率,远不如文告牒书体规整,这更证明它是私人日记。进一步分析,很可能就是王奉世入狱后,对探监文或营救他的人的记录。

王奉世是什么身份?据出土文告牒上的“男子王奉世”、龟纽铜质私人印章上的“臣奏世”等文字,再结合“一棺本椁”墓葬形制和“陶鼎二”随葬品来分析,他的身份应该是“士”级,或是相当于“士”级的小公务员。

“奴才”还是“臣”:

清代大臣自称究竟有何分别？

历史剧中,常见清朝官员对皇帝自称“奴才”,有的则称臣。查了一些资料,有的说,这是清朝区分满汉官员身份的制度性措施,满人只能自称奴才,不能称臣,汉人则相反;有的则说,满人也可以自称臣。真实情况究竟如何?

奴才亦作“奴财”“弩才”,在北方少数民族中是常见词汇

奴才一词,亦作“奴财”“弩才”,在中国北方各地,尤其是北方少数民族中,是一个常见词汇。魏晋以降,常常作为贱称、卑称或詈骂之词,出现于历史记载之中。另一方面,在北方民族中,臣与奴才本属一义,并无多少分别。如《隋书》卷84《北狄》:“沙钵略谓其属曰:何名为臣?报曰:隋国称臣,犹此称奴耳。”臣与奴才二词通假,起自于北方,由来已久。清入关以前,奴才一词已出现于官方文献中,可见,满洲旧俗,以奴才与臣相等,并不以为有辱国体。

清廷起于北方,满语中有阿哈(Aha),汉语意译为“奴才”。沿其旧俗,奴才一词在社会上也得以广泛使用。在很多时候,奴才及其衍生物词都是贱称和含有贬义的。入关后,这类词语有时也出现在正式官方文献中和煌煌上谕之中,如雍

正五年十一月,雍正帝上谕中有“此等卑污之习,皆始自包衣下贱奴才”之语。在此种背景下,称谓用语中出现“奴才”一词,是极其自然的事情了。

清入关后,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,并未对奏章中称奴才或称臣进行统一规定。沿袭入关前满洲旧俗,旗人面见皇帝及在给皇帝的奏折中,有用臣的,也有自称奴才的。康熙时期,仍有两称并用,甚至同一奏折中,既称奴才又称臣的情况。雍正元年八月,清廷试图统一相关称谓:“凡奏章内称臣、称奴才,俱是臣下之词,不宜两书书写,嗣后着一概书写臣字。特谕。”虽然旧俗,奴才一词在社会上也得以广泛使用。在很多时候,奴才及其衍生物词都是贱称和含有贬义的。入关后,这类词语有时也出现在正式官方文献中和煌煌上谕之中,如雍

乾隆要求满族大臣公事与私事分称臣、奴才

乾隆六年(1741年),贵州官员张广泗上奏请求将长子留在自己身边,奏折中,自称爲臣,而将儿子称为奴才,乾隆帝为此专门下旨,对张进行训斥。这表明,虽然旗籍官员奏章中仍然两称并存,但这一现象已经引起清政府的注意,对于旗下官员私事折,已经开始要求称“奴才”,以维护满洲旧俗。至乾隆二十三年(1758年),乾隆帝正式下令对官员自称进行规范。不过,这一次与雍正朝的要求统一自称为“臣”不同,乾隆帝要求公事与私事分开办理:“满洲大臣奏事,称臣、称奴才,字样不一。著传谕:嗣后颁行公事折奏称臣;请安、谢恩、寻常折奏,仍称奴才,以存满洲旧体。”

至此,清代官场谓中,奴才与臣的称呼规矩基本确定。《清稗类钞·称谓类》记载了奴才称呼运用的基本情况:“不独满洲也,蒙古、汉军亦同此称,唯与汉人会衔之章奏,则一律称臣。”同时,“汉人之为提督总兵者,称奴才,虽与督抚会衔,而称奴才如故,不能与督抚一律称臣也。王公府邸之属员奴仆,对于其主,亦自称奴才。”

东汉《封禅仪记》开启写日记之风
唐代日记对后世日记影响很大

在江苏邗江胡场五号汉墓“日记牒”出土之前,日记起源于“东汉说”也有市场,晚清学者俞樾即持此观点,其证据是东汉马笃伯的《封禅仪记》。

《封禅仪记》所记为东汉光武帝刘秀于建武三十二年(公元56年)封禅泰山的情况:“建武三十二年,车驾东巡狩。正月二十八日,发雒阳宫。二月九日,到鲁,遣守谒者郭坚伯将徒五百人治泰山道。十日,鲁遣宗室诸刘及孔氏、瑕丘丁氏上寿,受赐,皆诣孔氏宅,赐酒肉。十一日发。十二日宿奉高……”《封禅仪记》虽然没有称“日记”,但行文是按年、月、日的标准“日记体”来写的,逐日记写,故俞樾称马笃伯是中国最早写日记的人,他开启了中国人写日记之风气。

既然东汉人马笃伯已写日记,为什么又会有“唐代说”?这是缘于日记这种体裁在唐代基本成型。唐代日记篇幅不多,时限不长,工作、生活都记录,对后世的日记格式和内容产生了很大影响。

唐太宗时政治家韦执谊出使西突厥、石国,三年未返,其间韦执谊逐日写日记,后结集为《西征记》。张荫桓对《西征记》评价甚高,称之为“奉使日记之滥觞”。但对此观点,现代不少学者并不认可。

唐代最被称道的是宪宗时李翱的《来南录》,其日记特征更明显。李翱是韩愈“古文运动”的重要继承人,元和(公元806年~820年)初年任国子博士、史馆修撰。元和四年,李翱应岭南节度使杨於陵征召,从东都洛阳出发,历程7600里抵岭南,出任杨的幕僚。《来南录》就是李翱在漫长旅途中所写的日记。《来南录》落笔简略,实多虚少,具有中国人早期所写日记的特色:“元和三年十月,翱既受岭南尚书之命,四年正月己丑,自旌善第,以妻子上船于漕。乙未,去东都,韩退之、石凌川假舟送予。明日,及故洛东,吊益东野,遂以东野行……”

就《来南录》的地位,陈左高认为它是“我国现存之最早日记”,陈左高在其《历代日记丛谈》中谈的第一篇古人日记就是《来南录》。

北宋人喜欢写“官场日记”
南宋流行“旅行日记”

有学者认为,中国人写日记“萌芽于唐,发展于宋,衰落于元,盛于明清”。从内容来看,不外乎“事”“行”“言”“思”四大方面。从类型来看,则以“官场(工作)日记”“游记(出行)日记”“读书(创作)日记”“家居(生活)日记”为多。

当然,古人日记的内容在不同朝代也会有不同的风格。如在日记得到大发展的宋代,北宋人和南宋人写日记的兴趣便有不同,北宋人喜欢写“官场日记”。

南宋藏书家周焄《清波杂志》“元祐诸公日记”条称:“元祐诸公皆有日记。凡榻前奏对语,及朝廷政事,所历官簿,一时人才贤否,书之惟详。”元祐(公元1086年~1094年)是宋哲宗赵煦的第一个年号,司马光、王安石都属于“元祐诸公”群体,他们的日记都留下了翔实的政治资料。

到了南宋,“旅行日记”“出使日记”更为流行。如陆游从山阴(今浙江绍兴)赴任夔州(今重庆奉节)途中写的日记《入蜀记》、范成大在从成都往临安(今浙江杭州)路上写的日记《吴船录》,都是中国古代旅游日记中的代表作。而且,南宋的游记对后世日记写作影响深远,如明书画家李日华写的日记《缜召录》,仿《吴船录》;清王铎的日记《粤游日记》,跟从《入蜀记》;而文、字俱美的清郑观应的《长江日记》,也受到了前人游记的影响。

(摘自《北京晚报》)

筷子的进化史:

先秦时称为“桼”(jī ā)
明代时称为“快”或“筷”

筷子

我们的祖先何时开始使用筷子,已无可考。但这两根小玩意儿,一旦能熟练操纵,使用起来灵巧无比。难怪西方有学者赞扬筷子是古老东方文明代表。

“箸”的称呼始自商代
明代称为“快”或“筷”

筷子在先秦时称为“桼”,是木字旁,不是“快”。《礼记·曲礼上》提及“羹之有菜者用桼”,郑玄的注释是“桼,犹箸也”。司马迁的《史记·宋微子世家》谓“紂始为象箸,箕子叹曰:‘彼为象箸,必为玉桼’。”说明“箸”的称呼始自商代。

“箸”变成今天的“筷”,有个说法是与江南沿海的船民有关,因为“箸”与“住”同音,对船民而言有不吉利的意思,所以反其意称“箸”为“快儿”。又因为大多数“快儿”是用竹子所做,于是在“快”字上加了竹字头,成为“筷子”。

虽然明代已经有人称“箸”为“快”或“筷”,清《康熙字典》仅收录“箸”而不收录“筷”,但朝廷也难抵挡民间的潮流。“筷子”称为“箸”,在《水浒传》第三回写鲁智深大闹五台山,提到金老及其女儿宴请鲁智深一段,谓“春台上放下三个盏子,三双箸”;另外,《红楼梦》第四十回写史太君两宴大观园,曹雪芹虽然用“箸”,但用得最多的还是“筷子”。

《礼记》有所谓“饭黍毋从箸”,先秦时人们吃饭用手抓食,箸只用于夹菜。从饮食进化推想,原始社会以手抓食可谓自然不过,其后的食器发展为“匕”,曲柄浅斗,很像今天的羹匙。《说文·匕部》谓“匕,亦所以用比取饭”。今天的“匙”相信是由“匕”发展而来,但总不及用箸夹菜更为方便。

理论上,促成“箸”的诞生,契机应是熟食烫手。先民发明钻木取火,将食物煮熟后,随手用树枝捞取是合理推测,因为原始人类生活在森林和洞穴,最方便的材料是树枝。从现在筷子的形体来看,它还带有原始竹木棍棒的特征。

汉代时就已使用竹筷

1973年在湖南马王堆一号汉墓有“彩绘云龙纹漆案”出土,有趣的是,这漆案上面还摆放了五个写有“君奉食”的小盘、两个酒后、一个耳杯,杯上还放有一双竹筷,这足以证明汉代时就已经使用竹筷。

古代用筷子的情况也可参考画像砖。汉代盛行厚葬,墓室中大量使用精美画像砖,以反映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,因而留给后人丰富的形象资料。其中在四川出土的东汉画像砖《宴饮图》,图中有7人,正面3人、左、右各两人,座次井然有序,席前樽罍并列,碗碟横陈,除了案前放有筷子,也有碗中插着筷子的。

汉代画像石上有很多使用筷子的场面,在汉代人的饭桌上、盘子和碗里,都放有筷子,其中有幅《孝子图》,看到一个儿子拿着筷子,夹一块食物放在父亲的嘴里,以表示其孝心。另外,在敦煌的一幅壁画上,也是男男女女围坐在一起吃饭,每人面前除了一个小勺子,还有一双筷子。

法国思想家罗兰·巴特有一部比较文化著作《符号禅意东洋风》,探讨东方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。谈到筷子时巴特认为,筷子不像西方餐具刀、叉那样用于切、扎、截,因而“食物不再成为人们暴力之下的猎物,而是和谐传递的物质”。

(摘自《光明日报》)

掌故

“借光”的由来

“借光”这个词,现在已经成了人们普遍使用的礼貌用语。人们把凡是请求别人提供某种帮助和从别人那里分享某种荣誉称作“借光”。

“借光”这个词由来已久。据《战国策·秦策》记载,战国时秦国将军甘茂曾对齐国使者苏代讲过这样一个故事:一条江边住着不少人,每晚,姑娘们都凑到一起做针线活儿。其中有一位姑娘家境贫

寒,买不起灯烛,其余的姑娘嫌弃她,说她爱占小便宜,拒绝她来。这位姑娘说:我虽然买不起灯烛,但是我每晚都比别人先来,把屋子打扫干净,把坐席铺设整齐,让大家一来就能舒适地做活,这对你们多少也有些方便。你们的灯反正是要点的,借给我一点光又有什么损失呢?姑娘们觉得她的话有道理,便把她留下了。

(摘自《万事由来》)

“吃货”一词民国时已有
在民间普遍运用

吃货,指爱吃的人,多指喜欢吃各类美食的人,并对美食有一种独特的向往、追求,有品位的美食爱好者、美食客、美食家。吃货,如今已成为都市人群的日常用语,直截了当地表达着人们对美食生活的向往。

其实,早在1930年代,“吃货”一词就在民间普遍运用,口头语与书面语应当都曾出现,并不少见。早在1933年2月20日的北平《世界日报》上,就刊载过一篇署名为“吃货”的《废历新年》的文章。所谓“废历”,即指旧历、农历。原来,北伐胜利以后,国民政府颁布政令,通令全国自

1930年1月1日起,商民一律不许沿用旧历、过旧历年,而必须遵行公历、过公历年。而普通老百姓们对此并不买账,部分政府官员对此也不认同,仍旧按传统春节习俗,庆祝农历新年。这位“吃货”同志,身处河北南部的隆平县,看着当地热热闹闹的过年景象,感慨颇多,不吐不快,就给报社寄去了这篇文章。

其实,这位“吃货”应当是位爱国青年,他笔下的1933年春节,充满着对国家前途的担忧,流露着对国民素质的失望。

(摘自《北京晨报》)



欢迎广大读者朋友扫码关注鹤壁日报文史博览微信公众号,看更多精彩内容!